

摆正对外汉语教学里文化教学的位置

[美]俞志强 [韩]陶冶*

[摘要] 本论文着重研讨了如何在短暂而宝贵的时间里,既不限合理的内容,又不盲目添加非密切相关的文化因素;有选择性地配合课文来合理安排;以语言文化为主,以非语言的交际文化为辅,以知识文化为背景,摆正汉语教学中的文化问题的位置,扎扎实实地把对外汉语教学的工作做得更好。

[关键词] 文化因素;交际能力;文化教学

[Abstract]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regarding how to use precious classroom time to introduce cultural element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teach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It argues against the views that languages are treated as simple mechanic operations. It emphasizes the fact that languag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ulture and that communication skills are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understanding of cultural patterns. The authors explain why an important key for success in teaching Chinese is to optimize cultural teaching.

[Key words] Cultural elements; Communication skills; Cultural teaching

一、文化的含义

到底什么是文化?早在1952年,Alfred Kroeber和Clyde Kluckhohn就给文化列出了164个定义。这个数目随着研究的深入而不断扩大。据报道,季羨林先生曾经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一次讲演中说:“据说现在全世界给文化下的定义有500多个,这说明没法下定义。现在好多人写文章还在非常努力地下定义,这不过是在500个定义外再添一个501,502,一点问题都不解决,所以我个人理解的文化就是非常广义的,就是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对人民有好处的,就叫作文化。”

季先生的话指出了对文化进行定义的复杂性和困难性。但是在我们探讨语言教学中文化问题的时候,要想彻底回避文化定义的问题也不可能。如果我们对研究的对象没有一个大致相同的规定,那么我们常常会因为讨论对象的不一致,而导致看法大相径庭,风马牛不

* 作者简介:俞志强,美国纽约城市大学贝鲁克学院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系副教授;陶冶,韩国首尔CHINARO中国语学院高级会话讲师。

相及。

对文化进行定义之所以困难有几个可能的原因。首先,文化作为一种研究对象范围之庞大,可能超出了我们一般人思维的概括力。这就好像我们很容易看清一个球场的边界而无法断定宇宙的边际。其次,文化不同的范畴互相交叉,互相纠缠:语言里有文化,文化里有历史,历史里有政治,政治里有经济等。很难理出一个头绪。其三,对文化定义者的出发点各自不同。

定义与定义的目的有着密切的关联。比如,对“稻谷”这个对象,对于植物学家来说,可以是一种禾本科单子叶植物;对于农学家来说,是一种草本类稻属的粮食作物之一;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则是一种可以用来做成米饭的主食。

同样是针对“文化”这个对象,语言学家、汉学家、民俗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人文地理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等等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给出不同的定义。即使同属语言学家的方言学家、社会语言学家、语法学家、语音学家、词汇学家、历史语言学家也都可能给出不同的答案来。由于定义者的出发点各有不同,定义的结果也就形形色色。

更有甚者,即使同属对外汉语教学家,有着极其近似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促进对外汉语的教学,给出的结果也可能千差万别。为了使自己所推崇的理论更有说服力,提出一个有利于自己理论的定义来自圆其说,也不能说是违背了人之常情。以至于有的老师感叹对外汉语界里关于文化教学的理论与实践一直处于“理还乱”的状态。

我们通过上面的讨论,可以得知对同一个事物的定义不一定是唯一的,也没有必要是唯一的,可能应该就是不唯一的。一个复杂的对象可能被多种方式定义是很自然的。只要是严肃的研讨,在没有得出最终结论之前,在 502 个定义以后再加更多的定义不但不是多此一举,而是应该的。这样科学才能进步。换一句话说,正是因为那么多的定义都不满意,我们才更需要不断地探讨。

但是我们在提出定义之前,不能随心所欲,要有一些合理的限定:客观性、针对性、宽容性、公认性、公平性、普遍性。让我们先来看一个与我们密切相关、很多老师也比较熟悉的定义,再来阐述那些限定的含义。美国语言习得高级研究中心 CARLA(Center for Advanced Research on Language Acquisition)对文化的定义是:

Culture is defined as the shared patterns of behaviors and interactions, cognitive constructs, and affective understanding that are learned through a process of socialization. These shared patterns identify the members of a culture group while also distinguishing those of another group. (CARLA, 2009)

这个定义的大意是:文化是行为、互动、认知和感情交流里,通过社交来获得的、共享的模式。这些共享的模式既把本文化内的成员标识出来,又把这些成员与其他文化成员区别开来。

CARLA 的定义有几个特点:它比较客观,不是某一个作者为了自圆其说而设立的理论框架。它的针对性也很强,只针对语言习得和第二外语教学,因为这个研究机构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对不同文化的理解 and 研究,改善第二语言的习得与教学的质量。因为这个机构并不只局限于一种语言,而是面对所有的语言,包括汉语,也对其他语种有效,所以这个

定义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个研究机构在这方面经过全世界很多语言教学专家多年的努力,具有比较权威的地位。而且 CARLA 的定义也有一定的宽容性和公平性,在给出自己的定义以后,也列举了其他一些有关的定义供学者参考。

CARLA 的定义绝不是圣旨,更不是什么宗教的教条。我们没有必要盲从它,更没有必要把他们的定义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是把这个定义作为我们探讨问题的起点,给我们的问题一些启发,也是可以的。

根据这个定义,一个东西算不算文化与好坏无关。我们以为季羨林先生“对人民有好处的,就叫作文化”的观点是可以商榷的。文化的好坏可以有外部与内部的比较。无论是内部的比较还是外部的比较,我们都无法以好坏来评判文化的范畴。以外部的比较来说,我们不能说某一个国家的文化要比其他国家的文化好。如果说亚洲的文化比欧洲的文化要好,反之亦然,都是无从谈起的。日本的文化就比韩国的文化好,德国的文化就比英国的好,也是没有根据的。中国人生日一般习惯吃面条,美国人生日一般习惯吃蛋糕,究竟哪个对人民更有好处无从定论。中国人姓前名后,欧美人名前姓后,无所谓好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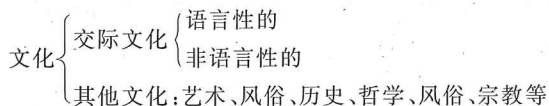
就同一个文化的内部比较而言,好的部分就是文化,坏的部分就不是文化,也是说不通的。中国古代妇女裹小脚是一种不争的劣习,对人民只有坏处,但是毫无疑问是中国旧文化的一部分。很多旧式的中国家庭盛行包办婚姻,如果不算中国旧文化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后来很多歌颂自由恋爱的文艺作品就无法理解,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悲剧也失去了意义。即使是骂街也与文化习俗密切相关。袁炎、张胜隆对冒语的对比研究揭示了很多这方面有意义的语言文化特点,阐述了冒语在外语教学里的意义。

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到语言其实就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包含语言。语言与历史、风俗、传统、宗教、思想、文学、绘画、雕刻等等都属于文化。如果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可以直接把语言叫做“语言文化”。对于这一点,不少同仁也有类似的赞同看法。在我们看来“语言文化”是一个偏正结构,而不是一个并列结构。

根据这样的认识,语言不再是一种仅仅靠机械原理来运作的符号的排列。怎么构词、怎么造句、怎么成章这些语言的基本工作原理,虽然是语言的很重要的部分,但是不再是语言的全部。如果我们限制语言课堂里的文化教学,那么我们教给学生的也许只能算是汉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一个即使学了很多汉语词汇语法的学生,因为并没有接触到汉语的全貌,在交际中会遇到困难是在预料之中的。

张占一(1984,1990,1992)、孟子敏(1992)把文化分为交际文化与知识文化,从功能的角度对文化分类作出了非常精辟的判断,有利于在文化内容里确定对外汉语教学中所急需的文化重点。交际文化直接影响交际的文化因素,而知识文化并不直接影响交际。语言既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它应该隶属交际文化,并受着其他文化的影响。

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来看,文化分为交际文化和知识文化以后,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交际文化内部可分为语言性的和非语言性的。非语言性的包括手势、眼色、态度、体距、礼节等等。我们根据以前专家的意见,并融入我们的理解,把各文化的关系用以下图表来阐释:



语言性文化内部受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也很大,而且程度不等。其中成语、典故、俗语、委婉语、含蓄表达、晋语等等受影响的程度尤其明显。比如,有一个美国华裔孩子整天淘气,他母亲说他:“你再不听话,我就发火了。”那个孩子吓坏了,问他母亲:“你的火会从哪里发出来?”这个孩子显然是懂得了字面意思,却没掌握真正的含义。另一个华裔的孩子参加一个象棋比赛,她执意提出要跟一个国内来的高手决一胜负。他父亲说:“你太小了,别人不把你放在眼里。”那孩子大惊,问:“人怎么能把另外一个人放在眼睛里!”经过解释,孩子总算明白了“不放在眼里”就是“不重视你”或者“看不起你”的意思。于是孩子对大师很郑重地说:“请你把我放在眼睛里,和我下一盘棋。”大家都觉得哭笑不得。如果一个有中国文化背景的华裔子弟都有这样的困惑,那么那些没有中国文化背景的学生的困惑就可想而知。

即使是汉字的写法也有文化的因素,而不能“照葫芦画瓢。”在英文里,大写的 T 和小写的 t 出头不出头,都是一个字母。F 这个字母笔画是否出头、是否相交都没太大的影响。许多字母有时加一画减一画也无所谓,比如有一种汽车品牌叫 Saturn,商标里那个大写字母 A 就少了一横。可是汉语不行。不讲解清楚,“午饭”成了“牛饭”;“大使馆”就成了“大便秘”;“已、己、巳”混成一团;“那个国家有多少人口”就成了“那个国家有多少入口”。真所谓“洋”相百出。

语法一般受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较小,可是也不是没有。如果去拜访一个比自己身份高的人,在尤其需要注意客气礼貌的情况下,敲门的时候一定不能说:“把门开开。”“把”字句在这种情况下显得语气太强。而一首中国著名的儿歌更说明了这个问题。大灰狼假装兔妈妈,尽管收起了尾巴,也企图改变嗓音,可是还是把句型用错了:“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暴露了狼外婆霸道的本性。又比如中文里的主动句与被动句,感情色彩大相径庭:“我太太知道昨晚的事”、“昨晚的事被我太太知道了”。后面一句不情愿被发现的口吻极重,与英文的被动句很不一样。这说明语法的应用也无法离开文化而独立存在。

对文化先定义然后分类,最终的目的是要分清教学任务的主次:即不能把语言里必要的各种文化内容限制得太死,也不能盲目讲授与文化有关的一切内容。就像对营养的摄取。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营养是人体最需要的。缺少了就要影响健康。太多了也会影响健康,过犹不及。打一个并不完美的比方:过去欧洲的海洋航船上常设有一个屋子,专门用来给水手锯腿。因为缺乏维生素,水手身体常常莫名其妙出血,肌肤腐烂。与其让腿烂掉病死,还不如锯掉。但是即使是与人的健康息息相关的维生素,也不能成为人体摄入的唯一营养。既不能有失偏颇,又不能过犹不及。这就是我们要摆正文化教学位置的重要原因。

二、什么模式都离不开文化教学

如果语言就是文化的一种,那么人类的语言与文化就一定是不可分割的。除了计算机语言,自然语言在没有任何文化的环境里被用作一种思想和感情的交流工具是不可想象的。既然语言与文化有那么紧密的关系,那么严格地说,教汉语而丝毫不触及中国文化也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自从有对外汉语教学以来,对相关文化知识的介绍就一直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进行着。即使是明确对文化教学持有保留态度的教学模式,也无法脱离文化而进行教学。

对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采取明显保留态度的,应该首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教

学模式。以周质平教授为主导的普林斯顿模式,继承了语言学家赵元任和汉语教育家陈大端等先生的传统,奠定了美国青山州明德模式的基础,继而开创了“普林斯顿在北京”教学计划和课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海外优秀的学生。

介绍普林斯顿及其相关模式的论文可见 2009 年夏在桂林召开的第 7 届国际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集中的几篇相关论文。其中有的作者指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创办的暑期中文短期培训班(简称普北班)不仅是中美高校联合办学开始较早、成效最大、影响最深广的跨国联合汉语培训项目之一,同时也成为中美高校汉语短期培训的典范和样板。”本文的笔者之一在明德、普林斯顿和普北都有过几年的实际工作经验,对这些教学模式有比较清楚的了解。

周质平教授对近现代中国思想史有着深刻的研究,对中国文化有着许多真知灼见。这样一位中国文化的专家在对外汉语教学上却采取了不在课堂上特意讲解中国文化的策略。这可能会让不少同行觉得难以理解。通过每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汉语教学会议,并聆听周教授的演讲,加上在普大工作的实际经验,我们基本上可以了解到普大不提倡讲解文化的实际原因。在普大看来,什么是文化,其内涵不完全清楚,外延没最后确定。似乎什么都可以属于文化范畴。如果老师在课堂上讲文化,很容易把教学变成文化知识的满堂灌,而游离了语言教学的初衷。

但是仅从这一点就推导出普大模式轻文化重语法也是不够全面的。严格说,普大也同时反对在初中级汉语班上讲解太多的语法知识。换句话说,普大并不是完全不讲文化,而是在怎么利用时间这个问题上采取的一种权衡。在普大,语法首先是通过学生预习课本中有关的语法注释,然后在大班上听老师用简洁的语言和易懂的例句来阐明语法的原理,最后通过小组分班的操练来复习并加深理解。如果对与语言工作原理直接有关的语法的讲解都要尽量压缩,那么对在语言里表现有时没有那么明显的文化现象的讲解受到限制的道理就不难理解了。

比如,在普大一年级的课本《中文入门》里有一个人物的名字叫“张儒思”。这个人物的名字,在一些倡导文化教学的老师看来可以引出很多文化的要素来。不但可以讲讲中国姓名与欧美不同的顺序,也可以谈谈它们的来历。加上对《百家姓》的阐述,确实可以让学生觉得获益匪浅。甚至可以利用这个“儒”字讲出不少有深度的中国文化问题来。但是这个名字在普大从来没人解释。历来就是一个人名而已。

根据普大老师不在课堂里发挥讲授文化知识,就得出普大汉语课里文化信息量不高的推断也是不正确的。根据普大出版的汉语教材,对中国文化问题有不少有趣的探讨。所以更精确的说法是普大对中国文化的介绍主要局限于与课本内容直接有关的部分,并不作进一步的文化发掘,尤其反对在这个问题上老师在上课的时候长篇大论。由于普大(包括明德和普北)都有老师与学生个别谈话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老师与同学谈到文化问题,并不受特别的限制,很多文化的知识在这个时候得到补充。

由于普大的这种策略,普大的汉语课都编排得非常紧凑。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准备,上课以后说话的机会大量增加,对生词语法句型的掌握比较扎实,发音比较准确,接触汉语的机会很多。当学生的汉语水平迅速提高以后,学生比较容易进一步自己主动地加入对中国文化问题的探讨。这些都是普大做得非常成功的地方。

但是由于普大对文化不做展开性的介绍,在遇到不解决文化问题就无法解决语言问题

的时候,多少有些举步维艰。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于成语(也包括俚语、歇后语、委婉语等等)的教学。因为成语涉及很多的文化背景,而且需要特定的使用环境,确实是一个教学的难点。有一个在复旦的英国留学生问他的中国同学:“如果两个人意见相同,有什么成语可以用?”同学未加思索地回答:“英雄所见略同。”后来该留学生在去寄信的路上碰见了语言学家许宝华教授。正好许先生也去寄信,该留学生马上活学活用说:“我们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闹了笑话,也可见成语难教。但是成语难教并不能成为回避的理由。相反,越是难教,越是不能回避。那个笑话的发生不是因为教了成语,而是因为教得不正确。

对于成语的掌握可以有两种情况:被动与主动。被动的掌握指学生遇到成语,可以理解但是使用时缺乏把握。主动的掌握则指学生可以应用自如。如果回避成语的教学,那么学生对汉语成语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掌握均会处于一种“无备有患”的状况。

还有一个原因致使普大对文化的讲解采取了限制或者回避的做法:那就是普大的教学模式奉行的主要是“听说法(Audio-lingual Method)”。该法以行为主义(Behaviorist Theory)为其心理学的理论基础,以 Leonard Bloomfield 的语言学为其教学的指导思想。普大的初中级语言课是通过典型例句用来阐释语法,用反复练习来掌握句型,尤其强调机械的训练(Drill)。而成语不是机械训练就能让学生充分掌握的,也不是靠几个例句就能演示清楚的,所以普大模式干脆不提倡在初中级汉语课里教授成语,但是成语毕竟是现代汉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有着关键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普大模式里一个有待商榷的地方。

三、仅仅注重文化教学还不够

1. 要注意综合平衡

从目前来看,语言课离不开文化的内容已经成了定论。尽管这一点无可非议,但是汉语教学里讲解中国文化的做法却并没有完全成为教学计划好与坏的绝对分水岭。换句话说,大力讲解中国文化的汉语课程,并不见得总能培养出很多优秀的学生,而限制讲解中国文化的并不一定就乏善可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我们认为原因之一是对问题缺乏综合性的考虑。

影响一个大学的汉语计划是否成功有诸多综合因素,但是就文化问题而言,仅仅有肯定汉语课程里要介绍文化的态度还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同时回答文化的范畴是什么。什么样的文化内容必须介绍,什么不要介绍,什么可介绍可不介绍。我们不能笼统地说,只要是中国文化就要搬到我们汉语课堂里来讲。

即使是分清了文化内容的轻重缓急,我们考虑问题的方法还不够全面,因为至少我们不能脱离了其他两个问题来单独回答:我们教学的目标及需要和我们同学的汉语水平。如果不考虑我们的教学需要,只要一涉及文化的内容,就撇下我们的语言教学目标,把有关的文化知识一网打尽都塞给学生。这实在不是一个很经济的做法。另一方面,不管我们学生的水平,只要一提到孔子恨不得把儒家学派讲个透彻,然后引申到诸子百家。这种做法是否有点事倍功半?文化介绍的范围是否要有一个科学的规定?是否只要是营养就应该无限补充?作为课堂主体的学生是否能够消化接受?

即使我们对以上所有的问题都能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我们离达到真正教出好学生这样一个最终的目标还有一段遥远的路要走,因为我们用什么方式去介绍文化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讲座、游戏、参观、幻灯、书报、电影、音乐、旅游、课内、课外等等,到底哪种方式最好?如果不解决怎么实际操作的问题,再好的理论也是纸上谈兵。而实际操作的问题与以上提到的其他问题也都有连带的关系。

比如,虽然游戏在某些情况下不失为一种好的教学手段,但是并不是“万能钥匙”。比如,我们在低年级用游戏来介绍“君子”这个观念实在容易弄巧成拙。又比如,有的老师讨论了怎么使用邮票来介绍中国文化(Leung, 2000)。尽管那篇文章文字生动活泼、道理深入浅出,但是没有具体提出该方法适合什么样的对象、适合什么样的语言需要、适合什么样的教学目标,那么其结果都常常是无效的放矢,对教学起到的实际作用很有限。

不讲究教学的范围、对象的水平、实行的方式之间的综合衡量,那么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即使有介绍文化那么一个良好的出发点也不一定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即使老师有很精彩的文化内容,有很高超的讲课技巧,为了顾全大局也应该暂时忍痛割爱。我们一定要分清上课的效果不等于学习的效果。老师把一堂汉语课上得眉飞色舞、同学听得津津有味固然很好,但是不等于学生就掌握了相应的语言技能。比如,有一个课文提到结婚的主题。老师准备了很多有关中国人结婚习俗的内容,包括电影的片段,还有各种照片。整堂课上得生动活泼,可是下课的时候有一个学生说:“我要结婚,我的女朋友在中国(I want to marry my girlfriend in China)。”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2. 要提高教学的效率

效率低,出产的数量低,很容易理解。但是在某些意义上来说,也就是质量低。比如,有一个学生在A老师的教导下,通过一年的时间就达到一个很高的汉语水平;而换一个B老师来教,要达到相似的水平则需要三年。那么A老师的效率就比B老师高。如果拿B老师教了一年的学生来跟A老师教了一年的学生比,那么肯定是B老师的学生差,换句话说效率低也就是质量低。把教学变得更有效是一个值得我们永远追求的目标。

既然文化对语言有那么重要的影响,很容易产生的一个错觉就是语言课里文化的内容越多越好。某些有关的研究虽然指出了文化教学的意义,并提出了一些方法,可是忽视了教学是有成本的这个事实。一个学生花在学习中文上的精力、一个人能掌握知识的能力、一堂中文课的时间、一个课本的容量、一个老师能讲解的内容等等都是有限的。除非一个老师本来的课上充满了不必要的废话,否则加入一些新的内容也意味着减少另一些内容。一个人在某些方面的所得往往是以这个人在其他方面的所失为代价。换句话说,一个学生在获得的同时也在失去。作为老师,我们有责任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为了学生的进步而“患得患失”。不考虑成本,“一味扩大生产”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要提高效率,一定要慎用展览式的教学方式。例如,中国的姓氏是很有特色的一个文化现象。不但中国姓名的来源与英美国家不同,而且含义也大相径庭。所有的汉语课本,只要有人物的,都会出现中国姓名。陈延河(2000)探讨了人名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的关系,对中外人名的异同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提出很多有价值的意见。文章研究了姓名的起源、历史、数量、含义、顺序、写法等等,并建议老师上课时把该班的每个同学的中国名字的含义“逐一讲解”。虽然该文揭示了人名在汉语教学里的作用,但是对成本问题考虑得不够,甚至没

有考虑。

一堂课通常只有宝贵的几十分钟。而要把姓名问题讲透,恐怕几节课都不够。如果讲了人名,再加上其他的文化问题,语言课的主要任务只能草草了事。其结果就是越俎代庖,语言课成了文化知识课。不能否认人名文化对学生理解汉语有某些作用,但是有用不等于适用。航天飞船要上天,很多东西都可以有用,比如钢琴。有了钢琴可以让宇航员减少工作的压力。但是在所携带的重量严格受到局限的情况下,目前还没有把钢琴带上太空以娱乐宇航员的先例。

我们也可以逆向思维的方法来看这个问题。不少国外的大学开创了介绍中国历史的课程,很多是针对那些不懂汉语的学生。用英文授课,这样没学过汉语的学生也可以直接了解中国历史的概要。对推广中国文化是很有益的。这样的课程一般在一到两个学期里讲完。如果老师发现学生可以直接读懂《史记》,那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就可以得到加深,便在课堂上开讲虚词的用法和古汉语的句型,那么作为一堂历史课应该算是失败了。因为老师没有成本意识:要想学通古汉语非一两年不可,而英文讲解的中国历史课总共才不到一年。

有些老师只要课文里一提到苹果,就把橘子、西瓜、李子、草莓、桃子等一大堆水果都列给学生;只要一提到狗,就把狮子、老虎、猴子、大象等动物都列给学生;只要一提到服饰,恨不得把五十六个民族的长衫、短裙都开个展览。这种不顾成本的无限扩大,其结果便是过犹不及,游离了我们语言教学的根本任务。

3. 要脚踏实地、从实际需要出发

有些语言现象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有些不深挖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而深挖又是一个无底洞。一个文化现象应该讲解到什么深度?挖多深才算适可而止?比如,2009年夏天在桂林召开的第七届国际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的开幕式上,广西师大的韩明教授提到的“君子”一词,并指出该词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要真正理解这个词的含义,非得有一番说教不可。要不要也提提孔子?“君子之德风”,要不要谈谈君子之德与风的关系?既然已经提到了“君子”,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顺便提提什么是“小人”?“小人之德草”,那么“风”与“草”又是什么关系,该不该讲?

很多词汇表面上与文化也没什么关系。比如,“笔、鞋、豆腐、裤子……”这些简单的词汇。我们干脆是用英文的“pen, shoes, tofu, pants...”来注释,还是深挖开去?中国的笔有好多种:毛笔就分大楷小楷、狼豪羊豪。加之写文章时的“败笔”并非我们的书写工具。鞋,也是名目繁多。除了草鞋、布鞋、皮鞋以外,是不是应该也谈到“A给B穿小鞋”的文化含义?是不是也应该指出“破了的鞋”和“破鞋”的区别?要不要帮助学生理解“吃豆腐”的真正含义与饮食无关、“穿一条裤子”与衣着无关?

对文化内容的讲解要展开到什么程度,应该根据学生学习任务的需要来定。而学生的学习任务,主要会受到课文安排的影响。脱离了课文和语言任务的需要,附加的内容虽然能增加一些兴趣,但是最终还是很容易被遗忘。有的老师一提到包饺子,就介绍一大堆动词:包、捏、折、蘸、挤、叠、握、掐等等。课文是老师和学生在教学上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为教学里发生的一切提供了一个演绎的场所。脱离了平台,老师和学生都无所依据,这些附加的东西都成了无本之木,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

我们不要期望把所有遇到的问题都一次讲透。课文是循序渐进的。类似的问题还会在

将来高级的课文里提到。姜丽萍在谈到《魅力汉语》的总体设计时,强调把结构、功能和文化相结合,可见作者的深思熟虑。有的老师可能会提出,如果课本在这方面非常欠缺,是不是老师自己应该增加补充材料?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临时凑合勉强可以,长远来看绝不应该。一个在文化方面品质低劣的教材,不能成为老师自己补充材料的理由,而首先应该是老师更换教材的理由。所以要把文化教好,教材是极其重要的。

介绍文化要画龙点睛,不要画蛇添足。比如,我们常提到的一个语言文化问题就是龙。尽管龙为传说中的神兽,或者妖物,中外皆有。很多学者认为龙在中国具有善良(benevolent)的个性,而在欧美则常是一个恶毒(malevolent)的怪物。为了不要引起误会,这些学者建议老师应当把中国龙的含义讲解清楚。但是事实上,中国神话里的恶龙并不少见。哪吒就杀了东海龙王的三太子还抽了它的筋。同样,欧美文学里也有威尔士红龙(Y Ddraig Goch)那样的善龙。1996年由Rob Cohen导演的电影《龙之心》(Dragonheart)则表现了一条具有献身精神的善龙。在电影的开头,我们并没有见到关于龙的文化差异的任何说教。观众也并没因此而觉得电影不可思议。因此,在教材里注释一下足矣。

讲文化,老师不应节外生枝、开无轨电车,但是要有强烈的文化意识。比如,“酒”这个词很多中国的教材里解释为“wine”,这是错误的。Wine在英文里专指用葡萄做成的酒,而中国的传统上的酒主要是用粮食做成的。“酒”最好翻译成“liquor”比较恰当。此外,印度人在给予肯定答案的时候是摇头,与中国人交流的时候很容易造成误解。英文里回答否定的反问句的方式与汉语也是大相径庭。问:“你不是张三吧?”如果被问的人是张三,按照英语的习惯应答成:“是,我是张三。”汉语的正确回答是:“不,我是张三。”这些问题都是一种非解决不可的问题,课文编写的时候要照顾到,不要总是让教课的老师“自力更生”。老师备课的主要精力要放在如何让学生对课文里的内容掌握得更快、更扎实,针对课文提出的语言任务设计出生动而有效的练习,而不是在一个文化内容匮乏的教材上,花大量的精力去“女娲补天”。更糟糕的是,如果一个教材里有关文化的内容不足,使用同一个教材的老师都在自己补充,大量的重复劳动,浪费惊人。

合理地提高教材里的文化含量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教材是同时面对老师和学生的。有了好的教材,学生可以预习、复习,老师可以有所凭据。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提高教材的文化含量,不只是增加注释。应该在有可能的情况下,最好以文化为课文讨论的主题,同时也要重视结构和功能的考量。国内很多教材、普大的教材,以及L. G. 亚历山大的《新概念英语》都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有了一个优秀的教材,老师学生才能脚踏实地。

4. 讲究方法

要提高效率不得不讲究方法,而方法要为目的服务。如果是给海外的学生讲解中国文化的一般知识,我们提议可以开一个中国文化概论的课程。如果是给海外的学生讲比较深入的中国文化的专题,那么可以开个专门讲解中国建筑、风俗、历史等等的课程。如果为了提高学生的兴趣,举办一些文化的讲座,引导学生展开一些游戏。这些课程各自有各自的目标、分工和侧重。这些都是有意义的。很多国家都有这方面的宝贵经验。周小兵(2009)也对文化教材发表了很深刻意见。但是我们以汉语为主要教学对象还是有所区别。因为我们以汉语文化里的语言性部分为主体,以交际文化里非语言性的部分为辅助,而以与汉语有关的知识文化内容为背景。

以什么形式解决文化问题最佳?中国文化可以有诸多的讲授方式:可以在语言课里穿插着介绍,可以另外开一门中国文化课用适合学者水平的汉语来集中讲解,甚至也可以干脆用学习者的本国语(比如英语)来传授。老师可以口头解释,也可以实物示范,或者引导学生参加一些与文化有关的游戏、亲手制作一些有关的工艺品,甚至可以走出课堂带同学实地参观。使用的材料可以包括课本、电视、录音、电影、实物、报纸、书刊。采取的方式可以有讲座、讨论、采访、提问、撰写文章。哪种最为有效实用?

如果有一个课文讲到了中国年,包括中国年的来历、时间、习俗和食物。老师把同学请到家里包饺子、请到中国城看舞龙舞狮、请到联欢会观摩歌舞,算不算尽到了一个语言老师的责任?还是那个老师越俎代庖、狗捉老鼠?如果一个老师只是照本宣科,这个老师是不是只能算敷衍工作,得过且过?或者我们应该把这些问题留给老师自己决定,看各位老师的兴趣热情和精力而定?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原则是:可以课外解决的尽量课外解决。必须课内解决的,以敏捷的方式解决。“课外解决”不是简单地带着学生走出教室,而是不占用上课的时间。有的老师可能会反对说,教到以中国历史为主题的课文时,带着学生走出教室,去参观一下中国历史博物馆有何不好?有什么过错呢?我们的回答是:不但无错,而且有功。老师利用业余时间带学生去参观值得敬贺。可是老师应尽量不要占用上课的时间。课堂里计划中的任务不能受影响。上课的时候老师可以结合课文指导学生要参考那些有关文化的阅读材料,简短解答一些同学阅读参观以后的问题。

课外老师可以组织学生参加一些与文化有关的活动。比如韩国建阳大学中文系的一些做法就很好:话剧组、学术节主持人小组、中国文化专题报告小组、太极拳组、长拳武术组、歌唱组、舞蹈和服装制作等小组。萧惊鸿和姜藜藜(2009)通过调查发现,在课堂内用“静态”的方法来解说文化的内涵“对学生文化知识水平的提升,是没有帮助的”。要多鼓励多元文化背景学生间的互动。曲凤荣(2009)明确提出开设综合文化体验课,但是“这门课的主要阵地不在课堂上”,而是要带领学生走出课堂进入当地各种文化设施,亲身体验中国文化。这些论文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5. 学生犯错与文化问题

有些老师喜欢搞百科全书式的文化教学,理由是不把某个文化问题教透,学生就要犯错。本文以及其他有关教学的文章里,我们常常也可以看到学生犯错的例句。举出学生犯错的例子常常是为了证明某种教法不正确需要改正。因为篇幅的问题和逻辑上的安排,我们无法对那些错误做一些即时的说明。现在我们把问题归总到这里谈一下:并不是学生所有的错误都说明对文化问题没有教透。

错误有其必然性。不犯中文错误的唯一办法就是不说中文。只要一学中文、一说中文,谁都会犯错,包括以汉语为母语的和不以汉语为母语的所有人。美国有一位以英语为母语的汉语老师去看某话剧团演出《高玉宝》。周扒皮爬入鸡笼学公鸡叫,然后催长工起来,说:“起来!起来!鸡都叫了。”那位美国老师指出,“都”字不能念第一声。如果是第一声,那么句子的意思就是“所有的鸡都叫了”。这与剧情不符。长工是不是起身,跟是不是所有的鸡都在叫无关。正确的念法应该把“都”念成轻声,意思是“连鸡都叫了,你们怎么还不起来!?”如果连中国人都要犯错,外国人在语言文化上犯错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

错误有大小。如果涉及的面大、造成的误会大,那么错误也就大。反之则小。如果犯错的人数多那么错误则较多,反之则小。有一个美国学生老是分不清“uan”和“uang”这两个韵母。你问她以前在哪里工作,她一定回答:“在床上工作过,”而她的真正意思是“在船上工作过”。这个错误对她本人的经历会引起误导,但是全班就她一个闹这个问题。并不说明老师的教法有什么问题。有些错误已经习非成是,不必大惊小怪。很多中国人都把“身宽体胖”的“胖”念“肥胖”的“胖”,而没念成“盘”音,也无所谓。

犯错也有成本。比如,我们以前有个低年级的学生,学完了“桌子、椅子、裤子、袜子”就开始无限发挥。有一次一个老师问他几点,他竟然回答:“不知道,我没带表子。”这个错误固然可笑,可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他毕竟花的时间不多。老师指出即可改正。还比如,“孝”的观念在欧美比较淡薄,如果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来静态讲解,而学生听后就成耳边风,那错误的成本就巨大,可以说是“亏损严重”,因而教法也一定要适当调整。

犯错也得看是谁犯错。一个中国人分不清“句子”和“橘子”那就成了笑话。而对一个外国人,广大的中国人态度就宽容得多。比如,以前我们有一个低年级的学生,她在学习期间有一阵心情特别不好。个别谈话的时候,老师问她是不是需要帮助。她一字一句地说:“我妈妈的蛋的系统要开刀,大家都不高兴。”原来英文字典里“卵巢”的“卵”和“鸡蛋”的“蛋”都是“egg”,引起了混淆。作为一个低年级的学生,自己主动查字典来与老师交流,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再看到她的处境,大家都很同情。还有谁会来笑话她呢?经过帮助,那个学生也学会了正确的说法,这不也是一个进步吗?

不少老师担心如果我们不讲透《百家姓》,学生就叫不出中国人的名字;不讲透中国怎么吃月饼,学生到了中秋节就无法过节;不讲透中国的风水,学生的床在中国就摆不对地方。一提起文化就恨不得让学生吞下一本文化的百科全书。这样的操心真是杞人忧天。事实上,不难发现无论我们怎样预防,面面俱到,学生在语用上、语法上还是要犯错。能尽量减少错误就是我们的成功。

四、结束语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掌握伟大中国的任何一种文化绝非一日之功。我们只能在短暂而宝贵的时间里,既不限合理的内容,又不盲目添加非密切相关的文化因素;有选择性地配合课文来合理安排,以语言文化为主,以非语言的交际文化为辅,以知识文化为背景,摆正汉语教学中的文化问题的位置,扎扎实实地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参考文献:

- [1] CARLA, <http://www.carla.umn.edu/culture/definitions.html>, 2009
- [2] Kroeber, A. L. and C. Kluckhohn, 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eabody Museum of American Archeology and Ethnology Papers 47, 1952
- [3] Leung, K. C. Teaching Chinese Culture and Language with Postage Stamps.《语言研究》国际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增刊,华中理工大学语言研究所
- [4] 陈延河.人名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国际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

- [5] 元华. 中美联办“普北班”的教学模式与启示. 第7届国际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多维视野下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6] 姜丽萍. 谈《魅力汉语》的总体设计. 第7届国际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多维视野下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7] 娄开阳. 美国明德汉语教学模式给国内长期班教学带来的启示. 第7届国际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多维视野下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8] 孟子敏. 交际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2(1)
- [9] 张占一. 汉语个例教学及教材.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4(3)
- [10] 张占一. 试议交际文化和知识文化.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0(3)
- [11] 张占一. 交际文化琐谈.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2(4)
- [12] 张英.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及教学思考. 第7届国际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多维视野下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13] 曲凤荣. 对外汉语教学中如何开发利用本地文化资源. 第7届国际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多维视野下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14] 李春梅. 浅谈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 第7届国际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多维视野下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15] 萧惊鸿, 姜黎黎. 学习经验与中国文化认知的相关研究. 第7届国际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多维视野下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16] 袁炎, 张胜隆. 汉英冒语对比研究. 第7届国际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多维视野下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17] 赵明德. 明德暑期模式的启示与教学模式的创建. 第7届国际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多维视野下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18] 赵永红. 非目的语环境下兴趣与语言实践活动. 第7届国际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多维视野下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